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3.008

“非物质劳动”批判:奈格里和哈特的 艺术生产思想及其当代美学意义

谭嘉仪,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与哈特共同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和理论观念。他们将“诸众”、社会关系、抽象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等重要命题置于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框架内进行考察,成功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与后现代艺术语境中激活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并融入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提炼出以救赎与抵抗为核心的艺术生产美学思想。非物质劳动思想在生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理论视角,为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与话语思路。

关键词:安东尼奥·奈格里;迈克尔·哈特;非物质劳动;艺术生产;审美救赎

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3-0056-06

2000年以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美国文学理论家、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合作出版了著名的“帝国三部曲”^①,提出并创建了后现代社会重要的劳动形式——“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的理论观念。非物质劳动广泛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生产与文学艺术发展的复杂关系,在理论范式上充分接续自马克思以来关于艺术生产思想的反思研究,深入拓展了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关于艺术与社会、文化与生产、审美与政治、劳动与资本等复杂议题的理论视域,展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美学新的理论视界与思想意义,值得当代美学研究予以重视与批判。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与理论思想广泛包含了“诸众”、社会关系、抽象与现实、生产与再生产等重要命题之间的复杂联系,特别是在非物质劳动及其衍生概念的美学内蕴的挖掘与阐释方面,对当代艺术生产理论的拓展与深化有积极的理论启发。本文从非物质劳动与“诸众”、非物质劳动与艺术生产、非物质劳动与社会生产等层面探讨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

劳动观念,并对他们提出的“帝国理论”观念做出批判与回应,以期对理解和把握奈格里和哈特的艺术生产思想及其当代美学意义提供一种参考的维度。

一 非物质劳动与“诸众”:生产主体的生成逻辑

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理论中提出的重要理论观念,此后二人在《宣告》(Declaration, 2012)与《集会》(Assembly, 2017)中再次以此作为理论阐释的基础,对当代西方社会发展进程展开理论批判,可见非物质劳动概念及其意义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性。

“非物质劳动”与“帝国”“帝国理论”密切相关。奈格里与哈特放弃“帝国”作为一种国家体系的传统意义,进而新的全球化文化秩序和政治格局中重塑“帝国”概念,将“帝国”视为一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即无权力中心与没有固定疆界的,由国家、超国家等机体构成并被单一统治逻辑所整合的统治机器。随后,二人提出了一种基于“帝国”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包含“帝国”的

收稿日期:2022-0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7ZDA269)

作者简介:谭嘉仪(1990—),女,广东中山人,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

^①“帝国三部曲”,即《帝国》(Empire, 2000)、《诸众》(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09)。

概念生成、理论内涵、运行机制等重要内容,并强调对全球范围内诸多领域进行整合,要在取消统治权力中心、模糊民族国家边界后,创造一个没有“内部”“外部”之分的世界,以批判被困于世界之内而失去从“外部”进行独立且纯粹思考能力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体系。

面对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社会生产主体必须要在生产中增强相互协作的能力与水平,获得自主生产的能力与自我统治的技术,才能在“帝国”内部获取与“帝国”展开对抗的主体性力量,而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就是非物质劳动,即“创造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产品的劳动”^①。这是奈格里和哈特对全球化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考察后给出的定义。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非物质劳动已成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范式转变的重要标志,体现了生产与消费、劳动与资本、文化与生产的新变化趋势。对非物质劳动的阐释与分析体现了奈格里和哈特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环境与条件的把握。非物质劳动具有多重的理论内涵,其首要的就是非物质劳动与“诸众”的关系及其展现的理论意义。

奈格里和哈特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主体的范畴与内涵进一步扩大,原先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革命性力量的资产阶级被“诸众”所取代。关于“诸众”的论述最早可见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的论述中。其中,斯宾诺莎在伦理层面构建的政治主体概念“诸众”对奈格里和哈特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的语言学方法,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的“生命政治化”导向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等论述,在“诸众”概念的构建过程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上述概念定义的比较分析,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预告“诸众”的出场:“诸众才是我们社会世界的真正生产力,而帝国只是一个依靠诸众的活力而生存的攫取机器。”^②随后他们提炼出“诸众”概念的普遍性含义,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创造性阐释:“诸众指的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体,它的行为基于奇异性的集合。诸众是一个内在不同的、多重的社会主体,其构成和行动不是基于身份或统一(或更不用说冷漠),而

是基于它的共同之处。”^③至此,“诸众”概念逐渐完善,成为兼具独一性与共同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情感性与身体性的重要概念。在“非物质劳动”的层面,以往单一的资产阶级生产主体概念扩展至“诸众”的层面,并正式以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非物质劳动”的新型主体进入人们的视野。

“诸众”还通过拒绝资本支配、反抗“帝国”控制而实现审美救赎并最终建构大同世界的新型社会主体概念。这种新型社会主体不仅身负反抗任务,而且需要学习自我统治的技术,以获得自主生产的内在性力量来摆脱资本的支配。“诸众”作为反抗的主体进行生产与被生产,并获得了生产的需要与意涵。在进入“生产”视界后,“诸众”与“非物质劳动”的内在关系逐渐浮现。对此,奈格里和哈特分别从身体、情感、艺术以及生命政治劳动四个层面阐释了“诸众”的生成逻辑,并在探讨过程中发现了“非物质劳动”中“诸众—生成”模式,展现了“非物质劳动”中主体的生产逻辑及其特征。“诸众”概念最终呈现多元的理论状态,其生产逻辑也因此变得多元。这种生产逻辑在身体、情感、艺术以及生命政治劳动等层次上展现出来,也体现了“非物质劳动”所蕴含的美学思想,它最终以一种美学化逻辑与生命政治化逻辑显现出来,这种逻辑也将“诸众”“非物质劳动”进一步推到艺术生产的讨论范围内。

二 非物质劳动与艺术生产: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治

过往占据全球经济中心的工业劳动在后现代社会被“非物质劳动”所取代,劳动在其中变得愈发抽象,资本试图通过“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将“艺术”收编,使之成为自身的一种生产力,并体现为资本对艺术的特殊生产“占有”。因此,“非物质劳动”纳入各种艺术生产与艺术“占有”的轨道,作为与劳动一样存在于商品世界中的艺术也不得不发生转向——从具体转向抽象,其生产模式也开始向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臣服并对其展开模仿,在此过程中产生大量仿品、赝品。艺术的生产手段逐渐从“对真实的表达”变成“对自然的再现”。“自然”不再作为艺术生产的参照物出现,

①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8.

②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Empi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2.

③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0.

而成为经过改良的形式表达,体现为一系列在“自然”或“自然物”的基础上的“变形”。

“非物质劳动”不仅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新型主体的变化,即“诸众”的生成;还表现为艺术生产关系的一种激变,即抽象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激变。通过“非物质劳动”中艺术与生产的关系、抽象与现实的关系,奈格里和哈特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艺术与劳动之间的新范式,并努力论证和分析艺术与劳动,尤其是艺术生产与非物质劳动中所展现的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洽,这是构建抵抗“帝国”理论的生产前提。他们认为,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洽在“非物质劳动”中主要表现为艺术生产的超越性与反抗性,并能生成一种具体的乌托邦精神与现实的批判精神,为“诸众”实现审美救赎与自由解放提供了明确的美学指向。

何为艺术生产的超越性?在“非物质劳动”中,艺术与劳动的抽象化使艺术生产获得超越性,经历“对真实的表达”的艺术生产阶段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物质劳动”通过抽象以创造新世界,在此中艺术也变得抽象。通过对抽象劳动的累积,“自然和世界都被艺术完全取代了”^①。一种具有本体论经验的艺术是不需要具体存在的,而非物质劳动的独一无二性恰恰参与了这个抽象的创造。在抽象的艺术创造中,劳动也渐趋抽象化,而愈发抽象的劳动又能生产出存在的超越。艺术所与生俱来的崇高感如同艺术的想象力一样,缝合感性经验和实践理性的界限,从而使乌托邦再度重现拥有可能性。所以,在奈格里和哈特的“非物质劳动”观念中,艺术生产的超越性是由抽象化的劳动提供的。在“非物质劳动”的理论框架内,这种抽象化的劳动具体实现路径就是反思性实践,即对艺术生产的“共同性”的承认。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艺术产品的“共同性”,仍无法避免受控于资本占有,但我们能感受到资本力量正逐渐被削弱。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艺术生产中,产品的本质或种类的差异性被允许存在。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中的艺术生产能在共同体中与自身以外的存在共享其生产力量,并以交流、合作等方式拒绝资本的支配与抵抗“帝国”的控制。

“非物质劳动”中的艺术生产还具有反抗性。奈格里和哈特通过对非物质劳动与艺术生产之间

的美学化逻辑联系展开思考与分析,推导出艺术发展中早已存在却从未被强调的历史性悖论——在一个已被内在性地征服了的世界里(资本主义新世界),艺术作品如何还能存在?如何还能发挥作用?本来艺术存在的目的与艺术生产的任务是征服与抵抗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矛盾,像此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提出的“单向度”,再之前的卢卡奇以及更早的马克思提出的“异化”等,但如今资本主义世界已被“内在性”地征服,艺术以及艺术生产还去征服与抵抗“谁”呢?因此,奈格里和哈特不得不以一种更为妥协的方式去解决此悖论:“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不再提供一个‘外部’,那么,人们就只能在其‘内部’把握并思考艺术活动。”^②我们不妨将二人所言的“抵抗”理解为对“内卷”的抵抗——一种艺术生产中的新型“抵抗”策略。奈格里和哈特所提出的“内部”的艺术生产策略,非但没有被困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的艺术生产“内卷”泥淖之中,反而间接地为“诸众”获得“内在性”的反抗理论提供了全新思路——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以“出走”的方式否定与对抗异化。艺术生产因而通过“诸众”在“内部”的“出走”,间接地获取拒绝资本支配、反抗“帝国”控制的内在性力量,并表征为否定与抗议。至此,作为一种“解放了的劳动”的艺术生产,即“意味着一种摆脱剥削之义务、摆脱雇主之异化、摆脱奴役的劳动。它意味着一种由欲望所诞生的劳动”^③。这种艺术生产策略将在理论与实践,为“诸众”在反抗“帝国”对人的控制、应对资本对社会的包围以及实现人类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一条行之有效的理论路径。因此,“非物质劳动”中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洽,在当代艺术生产中最终走向的是审美救赎的实现与抵抗机制,这也是奈格里与哈特划定的一条“非物质劳动”的生产路线。

三 非物质性生产与劳动转型:“生命政治生产”的理论探讨

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化的逻辑联系是奈格里与哈特艺术生产思想中的关键问题。通过对二者之间的理论与逻辑关系的分析探究,他们创造性地为当代艺术生产的生命转向提供了新的理论

①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②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xv页。

③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页。

视角,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模式新的考察路径。

通过分析20世纪中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的转变,奈格里与哈特探究了劳动转型中“非物质劳动”的崛起过程。他们发现,现代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导致劳动模式发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劳动在经济生产中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模式也从追求物质商品生产的单一模式,转向融合物质性、社会关系、情感生命形式的复合商品模式。由于受到这种时代语境变化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模式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并突出表现为劳动转型模式的出现。

确实,在当代社会中,商品的物质属性固然重要但并不唯一。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纵深发展,以及审美资本主义的提出,人们开始意识到审美品味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审美品味正在所有人身上壮大”^①,审美品味能够充分刺激商品消费与生产,导致“工业向审美的转变”^②。而在商品消费领域,附着在劳动与商品上的智力的、非物质的、情感的因素愈发明显且重要。劳动试图逐渐摆脱单纯物质层面上的生产、创造属性,开始走向与情感、经验、科技、智力因素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也是当代数字化社会、人工智能科技等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变化。奈格里与哈特充分阐释了劳动与生产的转型过程及其表现。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与生产在经历一拨又一拨的高科技发展、社会深度变革后,其内涵、功能、形式与形象已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劳动的形式并非只限定为机器的劳动,劳动的目的也并非只生产商品。进入数字化的人工智能时代,科技本身也是劳动,劳动不仅仅创造和生产产品,劳动特别是非物质劳动还灌注情感体验以及展现生命。这让我们“认识到劳动正生成为生命政治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让我们注意到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③,也使得“生命政治生产”在社会劳动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当代社会的非物质生产转向中,“生命政治生产”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变

形”在不断加深,并逐渐在当代艺术生产、艺术活动的审美感受与体验中产生深刻影响。对此,奈格里认为:“劳动转型为我们提供了阅读艺术转型的关键。”^④劳动发生转型,生产内涵“生命化”,艺术生产模式的突变以及艺术活动本体经验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过渡与劳动转型几乎同时发生,艺术体验与劳动模式转型也随之而来。劳动转型表征着时代变化的内容,而劳动转型所引发的艺术体验方式的变化,则通过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联系,显现为后现代社会生产模式中生产与再生产的重叠,这是在生产的整体性中展现出来的变化。而在具体的生产领域以及艺术表现领域,当代社会在非物质生产转向中,经济生产主导权的易主,则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目标从物质商品变成包含复杂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商品的生产,包括艺术生产,都广泛包含了“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情感反应等非物质产品”^⑤。

通过考察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转向与劳动转型,奈格里和哈特艺术生产思想中的“生命政治化”逻辑逐渐浮现。这是当代西方艺术生产理论发展的重要理论观念,也是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思想密切相关的理论观点。艺术生产的“生命政治化”,首先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条件下,充分吸收后现代主义社会转折的变革因素,融入对当代社会生产模式变革与劳动转型的深入考察,体现了充分的语境意识以及历史阐释思路。在理论上,奈格里与哈特将非物质劳动置于生命政治的层面展开讨论,引入“生命政治劳动”“生命政治生产”等范畴,完善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内容补充与理论更新,展现了“生命政治化劳动”的生成逻辑与美学旨归。但二人对当代社会某些具体问题的考察与阐释,特别是关于艺术生产的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深入辨析与辩证应用明显不足。他们希望构建一种新的劳动观念,来应对当代社会中全新的价值取向、劳动内容以及生产形式。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非物质劳动”概念,并将其划分为两种主要形式——涉及智力或语言的劳动和“情感劳动”,试图在此基础上走向生命政治劳动。这在

①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页。

②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5页。

③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

④ 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xviii页。

⑤ 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108.

某种程度上悬置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思想,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无法充分融入生命政治生产的具体过程,而标举出的“情感劳动”的内涵也比较抽象,所触及的社会与生产层面上的内容较为稀薄,这显然是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简单化处理。

当然,奈格里和哈特的论述在总体上还是展现出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启发。他们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探讨置于“生命政治”框架内展开,通过对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艺术、生产、劳动等问题的整合,使其构成了一个能够析出“非物质劳动”的核心概念与思想的理论大联合。这是二人重要的理论贡献,更是其思想的精锐之处。更重要的是,该理论大联合还充分展现了当代社会生产与劳动的生命、情感转向,非物质劳动得以在此基础上走向新的审美救赎与抵抗机制,这是奈格里与哈特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思想视野中显现出的新的美学追求。

四 非物质劳动的美学指向:一种新的抵抗美学的可能与阻挠

奈格里曾感叹:“世界已变得彻底物化和抽象。”^①“物化”的问题一直存在,从马克思、卢卡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人们一直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物化”现实与危机。“抽象”何在?奈格里与哈特所指的“抽象”是从劳动、生产尤其是非物质劳动中展现出来的生产、商品、生命与情感的抽象化。在传统意义上,生产、劳动、消费的价值归宿较为单一,商品的购买、流通、交换、消费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模式的关系较为明晰。然而,在当代社会,由于劳动转型、非物质生产转向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生产、消费、商品,附着了更多的社会关系、情感、生命等复杂的非物质劳动属性,从而使其变得愈发抽象。这直接导致劳动与商品的非物质手段加剧、抽象价值堆积、附加形象骤增,同时伴随更大范围的商品经济泛滥、审美品味骤降、劳动异化加剧等现象。资本主义生产危机与表现也因此变得更复杂多元。

非物质劳动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与抽象的根源,也是其表征。越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就越显现其重要,尽管这种重要性有时是需要加以批判的。当代社会的数字化、智能化、科技化,使

社会劳动从物质劳动向非物质劳动转型,是大势所趋,但其中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与危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这是奈格里和哈特艺术生产思想中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批判路径。特别是他们从艺术生产、艺术体验等角度加以批评,更加展现出“非物质劳动”的批判价值。在“非物质劳动”占据艺术生产主要领域的时代,通过对“艺术意义何在”“艺术生产的进程会如何”等问题的思考,奈格里与哈特意识到,基于艺术展开的审美救赎与抵抗理论是缺乏有效性的。在“非物质劳动”中,艺术以及艺术的生产更多屈从于非物质生产转向所带来的抽象化美学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救赎与对抗的机制来增强我们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找到内在于困境中的主体,并通过该主体完成从内到外的突破式反抗,所以“诸众”概念应运而生。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众多主体中,能反叛并抵抗资本主义与“帝国”对人的支配与操控的抵抗主体,包括抵抗艺术生产中的非物质转向所带来的抽象化。因此,奈格里和哈特将在根本上为当代社会困境提供可行的解决路径,诉诸为“诸众”提供内在性力量而实现对非物质劳动转向的美学抵抗。这是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审美救赎意识与艺术抵抗精神的理论接续,与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艺术自律的审美救赎理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审美救赎理论,巴迪欧、朗西埃、阿甘本等当代西方左翼美学家的美学政治学理论,阿尔都塞学派、后结构主义者福柯、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等,遥相呼应。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美学视野内,奈格里与哈特聚焦艺术生产机制,构建以非物质劳动为理论框架、以“诸众”为行动主体、以艺术生产中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洽为特征、以生命政治生产为理论核心的艺术生产美学,值得当代美学与文化批判理论者重视。

在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奈格里与哈特密切地关注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与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包括其中产生的种种阻挠机制。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已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劳动形式,代表现实的生产机制以及效能的变化。这不仅是生产层面的变化,更是在深刻意义层面上的生产劳动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组织形式等具体生活领域的变化。当我们愈发习惯并认可科学技术,不

^①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xiii页。

断被时尚之物的附加值所吸引,说明非物质劳动所带来的影响已然深入人心,针对非物质劳动而进行的审美救赎与抵抗,也因此充满了更多看不见的阻碍。在艺术生产中构建抵抗美学,并实现生命审美救赎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设想显然变得更加困难。

“非物质劳动”概念并非由奈格里与哈特最先提出^①,但经过二人的重新阐释,其得以进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的理论视野,成为研究当代社会演进与物质生产发展的重要理论资源。关于“非物质劳动”“非物质生产转向”“诸众”“生命政治生产”等理论问题的探究,为当代艺术生产实现其最终的美学指向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此同时,奈格里和哈特自觉地将艺术从“非物质劳动”的抽象化中析离出来,赋予艺术以及艺术生产更加积极的功能,使“非物质劳动”在此意义上获得了批判意义,从而具有了救赎与抵抗的可能。所以,奈格里与哈特的“非物质劳动”理论,总体上仍是批判性地发挥作用的,我们的理解与应用也应自觉站在批判性立场上予以分析。作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奈格里和哈特在“帝国理论”框架内推导出诸众与非物质劳动之间所遵循的美学化逻辑,使现代社会中生命政治生产的特征逐渐显现,为现代美学中的艺术生产理论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考路径。更重要的是,理论的内在意蕴与最终指向,与人们在日常生活领域的生产、生活需求高度重合,是一种具有积极现实关怀的美学思想。

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理论”自提出以来,在学术界引发了极大关注与广泛讨论,其中关涉政治、经济、社会等范畴的论述,更是占据着奈格里和哈特理论思想的重要位置。正因如此,作为奈格里与哈特“帝国理论”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非物质劳动”所蕴含的艺术生产思想也不断获得人们的关注。相比“帝国理论”,“非物质劳动”的思想因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日常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非物质劳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非物质生产”转向而衍生的产品,同时,也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承载着各种“生命政治生产”所带来的各种劳动抽象化的影响。而当代的艺术以及艺术生产,如何实现“抽象与现实的逻辑自洽”,如何面对“生产与再生产的主客重叠”等问题,如何在“生成—诸众”的逻辑构建中找寻到明确的美学发展方向,以引领当代艺术生产与艺术批判深入发展,仍然是奈格里与哈特面向当代美学与艺术生产所提出的理论问题。

Criticism of “Immaterial Labor”: Negri and Hardt’s Ideas of Artistic Production and Their Contemporary Aesthetic Significance

TAN Jia-yi & DUAN Ji-f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mmaterial labor is a key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idea proposed by Negri and Hardt. By placing important propositions such as multitude, social relations, abstraction and reality,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mmaterial labor, they successfully activate the concept of immaterial labor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Marxist aesthetic theory and postmodern art, and integrate aesthetic and artistic considerations to distill the aesthetic idea of artistic production with redemption and resistance as its core. The idea of immaterial labor puts forward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production, and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and discourse idea for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contemporary art production theory.

Key words: Antonio Negri; Michael Hardt; immaterial labor; artistic production; aesthetic redemption
(责任校对 葛丽萍)

^①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1985年曾提出“非物质”(immaterial)概念,用于描述电子信息技术科学及其方法;迈克尔·哈特与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于1996年编选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一书中,收录了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一文,在该篇文章中拉扎拉托首次提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用以概述当代社会劳动的新形式和揭示劳动主体的新变化。